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5

2011年1月20日

蘇星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與貢獻

中國土地學會 黃小虎¹

蘇星（1926~2008年），祖籍山東省萊陽縣，出生於內蒙古自治區敖漢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一生致力於研究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其特點是從專題入手，每個專題都經過數年乃至數十年積累。所研究的主要專題：城市住宅問題；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再生產的理論與實踐；價格改革；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蘇星的這些研究，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在專題研究基礎上，蘇星於晚年寫作並出版了《新中國經濟史》，這是迄今為止我國惟一一部個人撰寫的新中國經濟史專著。這部書以新中國50年的重大事件為線索，

¹ 本文係為張卓元、厲以寧、吳敬璉主編的《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經濟學》一書而寫，該書計劃於2011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全面、準確地記錄了新中國經濟發展變化的軌跡，為後人留下一部信史。書的體例、敘述風格和所用史料，都新穎、獨特、別具一格。蘇星生前曾擔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求是》雜誌總編輯、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等職務，一生主要從事理論宣傳和理論教育工作，只能利用業餘時間從事經濟研究。但他辛勤耕耘，持之以恆，取得了豐碩成果，出版專著 16 部，發表論文 250 餘篇。他的有關著作、論文，先後獲得首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論文獎、第四屆和第八屆中央宣傳部“五個一工程”獎、第五屆國家圖書獎。他還主持或協助主持了《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大學教材）、《政治經濟學辭典》、《簡明政治經濟學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經濟學卷）》（第一版）社會主義部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教程》（黨校教材）、《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經濟學部分的編寫工作。他是全國政協第五、六、七屆委員，第八屆常務委員。2004 年，被聘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諮詢委員會委員，為編寫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發揮了很大作用。1998 年，時任中央黨校校長的胡錦濤同志曾高度評價他“政治堅定，作風正派，為人寬厚，治學嚴謹”。

蘇星同志於 2008 年 4 月病逝，一年前即 2007 年 4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寫的《我的理論生涯》一書。他在書中全面、深刻地回顧總結了自己一生所做的理論工作。本文以他的這本書為主要線索，著重介紹他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方面的學術成就和貢獻。

一、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蘇星從事經濟理論研究的一個鮮明特點，是關注現實。他深入基層、一線，瞭解經濟生活中突出問題的來龍去脈，用自己掌握的馬克

思主義理論，發掘事物的內在規律，並長期跟蹤研究。他一生主要研究了以下問題：

（一）研究城市住宅理論。

1957年初，蘇星在工廠調查中發現，城市職工住房矛盾十分尖銳。他就這個問題廣泛收集資料，深入研究文獻，於年底發表了〈論住宅和房租問題〉。文章論證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住宅仍然是商品；分析了住宅價格及房租的構成；探討了城市住宅緊缺的經濟原因；提出了適當提高房租和允許私人擁有和建設住宅的建議。由於政治氣候的原因，這篇文章長期未受關注，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才引起有關部門重視。這時，城市住房問題的矛盾，比20多年前更加尖銳了。在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條件下，蘇星繼續進行有關研究，發表了若干文章和著作，如〈怎樣使住宅問題解決得快些？〉（1980年）、〈怎樣認識城鎮住宅商品化？〉（1986年）、《我國城市住宅問題》（專著，1987年）等。這些研究，進一步深入分析住宅的商品屬性，剖析住房投資和住房制度存在的問題，指出解決問題的出路是實行住宅商品化，並對各種商品化方案加以比較，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議。他的研究，在社會上乃至國際上產生了較大影響，對後來的住房制度改革實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其中，〈怎樣使住宅問題解決得快些？〉一文，獲1984年首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二）歷經曲折，研究農業合作化問題。

農業合作化問題，是蘇星一生中花功夫最多、延續時間最長的一個課題。1958~1998年，寫了兩本書和多篇文章，40年間可謂歷經曲折。

1958年他在病床上，寫了〈土地改革以後，我國農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一文的初稿。後來又大量收集資料，深入鑽研文獻，反復修改，1965年才公開發表。當時，在社會上產生

了較大影響。

文章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土改後我國農業走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文章分析了當時農業個體經濟的積極意義及其局限性。針對有人認為我國農業個體經濟是自然經濟的觀點，蘇星分析了我國的個體農業已經屬於小商品經濟範疇。他進一步分析，農業小商品經濟的前途，一是通過兩極分化，逐漸演變為資本主義農業，一是走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但在當時我國社會條件下，發展資本主義農業已沒有可能，惟一的出路就是發展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農業。

回顧 1950 年代，農業互助組和初級社，確實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發展。後來出問題，主要出在高級社和人民公社，否定了家庭經營的積極意義。蘇星的這篇文章，對於瞭解 1950 年代初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是有重要價值的。他對於小生產的局限性的分析，至今也沒有過時。但他是 1958 年以後開始寫作，那時人民公社已遭遇嚴重挫折，廣大農民自發地實行聯產承包，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對家庭經營缺乏全面認識，蘇星也沒能例外，這是他這篇文章的主要缺點。這個缺點，成為他後來的研究歷經曲折的起點。

“文化大革命”中，蘇星住“牛棚”，下幹校，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繼續研究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他利用幹校在農村的條件，虛心向農民請教，深入瞭解農村經濟社會的變化，農業生產與經營管理，農民的生活與思想，等等。從 1969 年開始，歷經四年，於 1973 年寫出了《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道路》一書的初稿。後經修改，由人民出版社於 1976 年 1 月出版。蘇星原來是想寫一部學術著作，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思潮氾濫，他既是受害者，同時也受“左”的影響，接受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等觀念，使這本書蒙上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黨的 11 屆三中全會以後，經過撥亂反正，蘇星對書中的“左”的觀點開始有所認識。為了對讀者負責，他於 1980 年對原書作了重大修改，刪去了批判劉少奇路線、人民公社好等內容，書名改為《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他在序言中，對自己在原書中的“左”的觀點，作了嚴肅認真的自我批評。由於擺脫了極“左”政治的束縛，凸顯了這本書的學術分量。總的看，是延續了 1965 年發表的文章的觀點，但在理論分析上更加系統、深入了。不足之處，對農業個體經濟的認識，依然存在片面性。

這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已經啟動。儘管蘇星在新書序言中，還沒有對過去反對包產到戶作自我批評，但他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轉變。1982 年發表的〈責任制與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一文，表明他對家庭經營即農民個體經濟有了新的認識。1998 年，他又寫了〈正確認識農民家庭經營〉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農業生產的特點，決定了家庭經營會長期存在。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也可以實現農業現代化。在土地集體所有條件下，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可以發展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因此，除少數例外，在農村辦任何事業，如發展鄉鎮企業、實行農業產業化、擴大規模經營、搞活土地使用權流通、建立新型合作經濟等等，都不要試圖改變家庭經營這個基礎。這篇文章，標誌著蘇星最終完成了對農業合作化理論的艱難研究。

（三）研究社會主義再生產理論。

1958 年的“大躍進”和“三面紅旗”，違背了客觀規律，使國民經濟遇到嚴重困難。1961 年黨中央決定，用三年時間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調整，就是恢復被破壞了的的比例關係。在這個背景下，社會各界特別是經濟理論界，紛紛反思、探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有關問題。例如，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的關係，工業內部輕、重工業之間

的關係，工業生產與基本建設的關係，新建企業與原有企業的關係，基本建設投資與固定資產更新的關係，固定資產的有形損耗與無形損耗的關係，國民經濟的積累與消費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都涉及如何認識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還進一步引申出，國家與企業的關係、企業應不應該追求利潤、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資金利潤率和生產價格等問題，這就觸及到經濟體制改革了。

蘇星積極地參與了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討論，陸續發表了幾篇文章，如〈有關工業生產的幾個問題〉（1961年）、〈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幾個問題〉（1962年）、〈關於固定資產更新問題〉（1963年）。1963年，他在《紅旗》雜誌社任經濟組負責人，受孫冶方有關研究的啟發，建議《紅旗》雜誌社主持舉辦“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雙週座談會，約請經濟理論界和經濟部門的一些同志，定期召開。會議堅持平等探討的原則，學術氣氛活躍，後期轉為討論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問題，持續了將近兩年。儘管後來“階級鬥爭”的氣氛越來越緊張，會議的主要參加者孫冶方又被陳伯達內定為“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分子”，但會議始終沒有超越理論探討的範圍，對推動當時的經濟研究，發揮了積極作用。

後來，開展“四清”運動，搞“文化大革命”，正常的理論研究不能開展了，但這些問題始終盤旋在蘇星的腦海裡。打倒“四人幫”以後，經濟建設又一度被“躍進”氣氛籠罩，重新燃起他研究社會主義再生產的熱情。他對這個問題作了全面梳理，寫了《社會主義再生產的理論與實踐》一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87年出版。

全書共分三篇，第一篇主要論述社會主義再生產理論及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應用。第二篇是講國民經濟中的主要比例關係，包括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種植業和畜牧業，能源，交通運輸等

五章。第三篇講資金和物資的平衡，包括財政、信貸和物資的平衡，積累基金構成和生產資料的供應，消費基金構成和消費資料的供應等。第二、第三篇著重探討新中國經濟建設中，一些具體問題的經驗教訓。這些經驗教訓，有的今天已不一定適用了。而第一篇則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意義，對我們認識與分析經濟運行的規律，仍然很有幫助和啟發。

第一篇的主要內容簡介如下。

第一，再生產理論起源於資產階級重農學派的創始人弗朗斯瓦·魁奈，後來的古典學派不僅沒有進步，甚至有決定性的退步。

第二，馬克思、列寧對再生產理論作出重大貢獻。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二卷，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與貨幣的循環運動，作了深刻的分析和出色的闡述。馬克思研究的對象，是社會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但他闡述的基本原理，對於其他社會形態，特別是對於社會主義社會，同樣是適用的。馬克思本人在《資本論》中，後來的列寧在有關著作中，對此都有明確表述。

第三，社會主義再生產理論研究的對象，是社會總資金，而不是社會總產品或其他。社會總資金的循環，不僅考察企業資金的流通，而且考察一般商品流通；不僅考察生產消費，而且考察個人消費。分析兩種流通和兩種消費的內在聯繫，可以更好地安排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

社會總資金在數量上大於社會總產品，例如，不同產品的生產過程的物質性質不同，周轉時間有長有短。有的部門在較長時間內取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卻不提供產品；有的部門在同樣時間內，不斷或多次取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同時向社會提供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認識這一點，對於正確安排農、輕、重的比例關係，基本建設和現有生產的關係，都有現實意義。

第四，研究社會主義社會資金再生產的出發點，是社會總產品。從使用價值考察社會總產品和整個社會生產的構成，分為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部類。這個劃分，反映了生產與消費的依存關係，及各生產部門互為市場的關係，是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國民經濟的主要比例關係，如工業與農業的比例關係，工業內部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農業內部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能源、交通與工農業之間的比例關係，實際上都是部門之間相互提供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關係，可以歸納為兩大部類的關係。產業結構的劃分包括三次產業的分類，都不能取代兩大部類劃分的理論意義。

從價值角度考察社會總產品的構成，分為轉移價值、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和剩餘勞動創造的價值三個部分。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規模與速度，主要決定於剩餘勞動產品有多少用於積累。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的比例，是國民經濟最重要的比例關係。而社會總產品的價值構成，則是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形成的前提。

第五，社會生產兩大部類的產品互為市場。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必須經過交換，從價值上和物質形成上得到補償，才能進入生產消費和個人消費，實現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長期以來，蘇聯和我國經濟學界不承認生產資料是商品，是錯誤的。兩大部類的交換，必須有貨幣作媒介，結果使商品內部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表現為商品與貨幣的外部對立。

第六，既然積累基金來自於剩餘產品價值，按道理，計算積累率應當計算積累基金與剩餘產品的價值之比。但實際生活中，都是以之與國民收入相比。國民收入中的必要產品同積累基金本無關係，計算進去，積累基金的界線在理論上就難以區分了，只能憑藉經驗。我國經濟建設長期的經驗表明，積累率在 20~30% 之間，可能比較合適。

從 1961~1987 年，蘇星用了 26 年時間斷斷續續研究社會主義社

會再生產問題，這本書的出版，標誌他的研究告一段落。後來，他又陸續發表過幾篇文章，基本上沒有超過這本書的論述。

（四）研究價格改革。

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以後，農產品價格問題突出了；城市擴大企業自主權改革，也突顯了工業品價格問題。在這個背景下，蘇星陸續寫了一些研究價格改革的文章。如〈農產品價格問題〉（1979年），〈生產資料的價格與價值規律〉（1981年），〈價值規律與物價方針〉（1981年），〈商品生產與價格問題〉（1985年），〈1985年一號文件下達以後〉（1985年），〈價格改革的幾個理論問題〉（1985年），〈價格改革與平均利潤率〉（1992年），等等。他的其他文章，有些也涉及價格改革問題，如〈山東省國營企業改革調查〉（1981年），〈中國穩定物價問題〉（1982年），〈北京市商業調查〉（1990年），〈搞好國營大中型企業的關鍵是搞活〉（1991年），等等。

實際上，蘇星在1950年代就關注新中國建國初期穩定物價、戰勝惡性通貨膨脹的鬥爭經驗；在196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中，思考通貨膨脹形成的原因及解決辦法；在社會主義再生產討論中，探討生產價格問題，這都為他後來研究價格改革奠定了基礎。

蘇星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歷史時期，研究價格改革的，他對當時某些問題的看法和判斷，難免帶有時代的烙印。但他分析問題所運用的主要理論觀點和方法，今天乃至將來，仍然是站得住的。這些觀點和方法如下。

— 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價值規律的實現形式是生產價格。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同時，也反映了不同部門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客觀要求。生產價格作為理論的抽象，只是反映了客觀發展的趨勢，不能把它簡單地等同於市場價格。受供求關係和其他因素影響，市場價格是不斷波動的。

— 影響供求關係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貨幣投放與發行。基本建設投資過多，生產資料價格就會上漲。消費基金增長過猛，生活資料價格就會上漲。財政、信貸與物資不平衡，靠發行貨幣彌補赤字，物價就會普遍上漲。掌握好資金與物資的平衡，有利於推進價格改革。

— 在計劃價格和市場價格並存的情況下，價格改革的方針，一是調，二是放。對於計劃價格，要經常調整，調整的依據是生產價格理論。不調整，就會阻礙產業或地區的發展。山西省長期調整產業結構步履艱難，主要原因是國家對煤炭實行低價政策，並長期沒有調整到位。搞活經濟的重要措施之一，是放開價格，能放開的都應放開。否則，產業或企業就沒有競爭力。1985 年以後，放開農產品價格，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一些地方存在問題，主要源於仍有一定的價格控制。對於一些與人民生產、生活關係密切的產品，與其控制價格導致企業經營困難，不如放開價格並適當補貼有關生產者和消費者。例如，對一些農業生產資料實行低價，效果並不好。不如放開價格，同時給購買農機的農民以補貼，既有利於企業擴大再生產，又有利於調動農民使用農機的積極性。

— 我國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新中國成立後，不斷提高農產品價格，降低工業品價格。1958 年“剪刀差”恢復到 1936 年的水平，但比價仍不合理。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比價，從農業部門為工業建設積累一部分資金。1958 年以後，價格雖然沒有大的調整，但“剪刀差”實際呈現擴大趨勢，原因一是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得快，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得慢；二是農產品成本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確定農產品價格，就要考慮級差地租的第二形態。如果增加投資的生產率遞減，導致生產成本增加，不提高產品價格，生產者就會虧損。只要農業生產率沒有大的提高，相應的農產品價格就會是提高的趨勢。

— 對礦山產品的價格，也要考慮級差地租問題。煤礦普遍虧損，與煤炭價格沒有充分反映級差地租因素，有很大關係。

蘇星研究價格改革的這些觀點、方法和主張，已被改革的實踐所證實。

（五）研究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

1983年初，蘇星到華東三省市調查工業公司問題，思考國有企業改革，形成了實行股份制的想法。後來，有些企業搞這方面的試點，蘇星對當時比較有影響的北京市天橋百貨商場和瀋陽市小型壓縮機廠，進行了調查瞭解，進一步作理論方面的思考與探索。1987年初，在反對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高潮中，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批了幾份材料給有關領導，內容是香港報刊刊登的厲以寧教授關於股份化改革的建議，和一位老同志對厲以寧的批評。有關領導要蘇星提出自己的看法，寫出報告送中央領導同志。他認真仔細地研究了厲以寧的觀點和主張，實事求是地寫了自己在哪些問題上贊同厲的觀點，在哪些問題上有不同的認識，並明確指出，作為理論學術問題，應當允許探討。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蘇星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件事，也促使他更加深入思考股份制問題。

蘇星認為：

— 生產社會化的趨勢是，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協作範圍越來越廣，有的部門的規模越來越大。有的大企業，個別資本已無力興辦，需要通過信用手段出售股票來集中資本，於是出現了股份公司。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是社會化大生產，股份公司一類經濟組織，按理應當更適合於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性質。

— 社會閑散資金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的企業都實行股份制。組織股份公司，是搞活全民所有制企業的一種比較好的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形式。應從實際出發，探索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的多種途徑，

總的方向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改革要統籌兼顧，不能一哄而起。厲以寧主張，對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現有大企業，繼續實行國有，完善經濟責任制；對小企業，可以租賃、承包、拍賣或改為合作經濟組織；對一般行業的大中型企業，將存量資金量化為股份，確定國家持股比例，把其餘的股份出售給個人或企業，形成國家、企業和勞動者聯合辦企業模式。前兩種主張實際上已經在實行，還需進一步深化。後一種主張，是否一定有利於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值得懷疑。現實生活中，股份制已經存在，各試點企業的做法很不一樣，理論界的觀點更是五花八門，厲的觀點只是其中一種。對股份制及其具體的實施意見，不宜籠統地否定或肯定，應當允許探索。

— 有的觀點認為，全民所有制的主體不明確，是產生種種弊端的根本原因，改革的方向是實行企業所有制或私有制。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理由是：第一，在我國，公有制佔主導地位，公有制的主體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一變，整個經濟基礎就動搖了。第二，我們已經找到了通過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增強企業活力的路子，應當總結經驗，繼續前進，不需要改弦更張。第三，我們的社會制度不允許全面恢復私有制，企業所有制世界上尚無成功的經驗。第四，我們過去的經驗表明，生產資料所有制應相對穩定，不宜輕易改變，才能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

— 有的觀點認為，應當通過股份制，把全民所有制的資金部分或全部歸職工個人所有，才能明晰產權關係，把個人命運和企業結合在一起。否則就無法改變企業職工不關心企業生產經營，企業經營者也不關心效益、質量、技術進步的狀況。這種看法，值得懷疑。

首先，根據不充分。從我國的經驗，還得不出全民所有制企業辦不好的結論。解放初期，我們在沒收官僚資本的基礎上建立了全民所

有制的國營經濟，經過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調動了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國營企業一度不僅比官僚資本辦得好，而且比私營企業辦得好。後來辦不好，是讓“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搞亂了。改革開放以後，有了經營自主權的企業，許多也是辦得好的。

其次，用這種辦法，也不一定就能把個人命運與企業結合在一起。美國盛行發行面額很小的股票，資本家的目的，一是集中資本，二是股東越分散越容易控制企業。工人買了股票，不一定就關心企業經營。工人之所以購買股票，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個人所得稅率高，出售股票所得可當作資本收益，稅率比較低。不妨設想，把全民所有制企業的部分或全部資金，作為職工個人的股份，發行股票。如果允許股票自由流通，就不一定把個人和企業命運結合在一起；如果不允許，那就是債券。按債券分發股息紅利，實際等於增加工資。結果會相互攀比，都增加工資，消費基金就會大大膨脹。這恐怕行不通。

蘇星對股份制的研究，並未形成專題性的成果。他的觀點，已經經受了歷史的檢驗，還將繼續經受檢驗。前些年，有人提出，蘇星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是我國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蘇星在世時曾明確表示，他不贊成這個說法。我國的股份制改革，最終發展出股票交易市場即資本市場，蘇星並未專門研究這方面問題，這可能是他不贊成的原因。

（六）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以後的十餘年間，不斷加大市場調節的比重和力度，但對要不要實行市場經濟，始終沒有明確，理論界也存在分歧和爭議。在這個背景下，蘇星是一直主張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觀點的。1992年黨的14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蘇星認真學習和理解中央的精神，並開始系統地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表面看，彎子轉得不小，但對他來說，並不勉強和困難。早在計劃經濟時期，他就認為我國經濟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商品經濟。在當時理論界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的討論中，他屬於“寬派”，認為不僅消費資料是商品，生產資料也是商品，並主張國家計劃應以價值規律為基礎。改革開放以後，他雖然主張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但也明確表示，不贊成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1982年，他赴澳大利亞講學，講“中國計劃經濟與市場”問題時，他說“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們往往把社會主義經濟稱之為計劃經濟，把資本主義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這種說法，沒有反映出兩種經濟制度的本質，而且很容易引起誤解，似乎社會主義經濟是完全排斥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完全排斥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但並不完全排斥市場和利用市場機制；資本主義不是計劃經濟，但也不完全排斥計劃。”這個講稿，當年就公開發表了。由於有這樣的認識，他歷來不贊成把對搞計劃經濟還是搞市場經濟的探討，上綱為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1992年上半年，他在中央黨校講課，甚至提出，從發展趨勢看，市場調節的範圍會越來越大，將來有可能成為主要的調節手段。這與他研究價格改革，主張能放開的儘量放開的觀點，是一致的。這些，都是蘇星自覺接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範疇的思想基礎。

一旦接受，就開始研究。1993年發表論文〈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1994年出版專著《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本書獲當年中央宣傳部“五個一工程獎”；1997年主持國家社科研究“九五”規劃委託研究重大項目：“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歷時四年，於2000年底完成。這個項目，由中央黨校、國家計劃發展委員會和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共同承擔。蘇星負責項目的總體設計和組織領導，撰寫總報告的第一篇並負責總報告的統一定稿。總報告作為專著單獨出版，三個分課題成果也分別

出版，構成一套叢書。

在《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書的序言中，蘇星對自己從主張計劃經濟轉變為接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範疇的原因和過程，作了明確的交待，表現了一個嚴肅學者實事求是、對讀者負責的態度。他特別說明，寫這本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但有些問題很可能並未弄清，歡迎大家批評。

歷經數年研究，蘇星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認識，終成體系。摘要介紹如下。

— 新中國成立初期，存在多種經濟成分。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數量眾多的國營的和公私合營的中小企業、集體農業和手工業，也依存於市場。當時，只對部分國有或公私合營的大企業實行直接計劃；對其餘的國有企業、公私合營企業、集體農業和手工業實行間接計劃；對於私企、個體農業和手工業，則通過加工訂貨、預購合同、價格、稅收、信貸等經濟手段，把他們納入計劃軌道。由於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那時的經濟生活並不僵化。問題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建立了單一的公有制經濟結構，實行與之相適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對於建立社會化大生產的物質基礎，是發揮了積極作用的。但其弊端，一是把企業管死了，二是把價格管死了，使經濟陷於僵化。這個弊端越來越突出，靠計劃經濟自身難以克服。

—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國有企業從擴大企業自主權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的廣泛發展，為市場經濟塑造了微觀基礎。價格改革和其他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則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在宏觀上創造了條件。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就是在客觀實踐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

— 鄧小平的重大貢獻，是在理論上闡明了在公有制條件下，也可以實行市場經濟，論證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長期以來，不管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社會主義只能實行計劃經濟，而市場經濟只能以私有制為基礎。鄧小平的理論，是對傳統教條的一大突破。在傳統觀念的指導下，蘇聯、東歐的改革走了私有化的路子。中國的改革開放，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取得了鉅大成績。但這是一條全新的道路，沒有現成經驗可以借鑒，必須在探索中前進。

— 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都是市場經濟，集體經濟大部分也是市場經濟。主要實行計劃經濟的，只有國有企業。因此，多種經濟成分發展起來以後，國企改革就成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心環節。

— 國企改革的關鍵，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具體的經營體制或形式，應從實際出發靈活多樣。股份制是一種較好的形式，但不宜“一刀切”。“私有化”不符合中國國情；變為各級政府所有，不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也不利於向市場經濟轉變；企業所有，理論上是個模糊概念，如果是指歸職工所有，其實就是集體所有，全民所有的資產歸一個企業職工所有，不合理因而行不通。

— 建立健全宏觀調控體系，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宏觀調控主要有三項任務：一是保持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包括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積累基金與消費基金的平衡、資金與物資的平衡；二是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包括安排好工農業增長速度的比例關係，安排好基礎產業與整個經濟發展的比例關係，安排好一般產業與支柱產業的比例關係，安排好一、二、三次產業的比例關係；三是

引導國民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特別要處理好經濟發展與保護生態環境的關係。宏觀調控要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符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主要運用經濟手段，輔之以其他手段。為此，必須轉變政府職能，改革行政管理體制。

— 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就是商品經濟的運行規律，主要是價值規律，也包括剩餘價值規律、平均利潤率規律等。馬克思主義對商品經濟規律的研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雖然由於歷史條件限制，個別論斷並不準確，但其基本理論觀點和方法，對研究和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七）積之 50 年，研究與寫作《新中國經濟史》。

1999 年建國 50 週年前夕，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了蘇星撰寫的《新中國經濟史》，全書約 55 萬字。2001 年，該書獲國家圖書獎和中央宣傳部“五個一工程獎”。後來，蘇星又根據新發現的史料，作了一些修訂，仍然是約 55 萬字，於 2007 年再版。

與同類著作相比，蘇星的這部著作有以下特點。第一，這是迄今為止惟一一部個人撰寫的新中國經濟史專著。第二，擺脫了機械地按年代順序敘述的套路，抓住新中國經濟建設中的重大事件或問題，講清其來龍去脈。在介紹某一問題時，可能需要倒敘歷史，例如講改革開放後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回顧了 1950 年代後期和 1960 年代初，農村就出現“包產到戶”試驗及被扼殺的情況。但由於這些問題或事件本身存在客觀時序性，縱觀全書，還是遵循年代順序的。第三，緒論講新中國誕生的艱難歷程；第一章講從戰爭年代解放區開始的國有經濟的產生與發展；第六章專門有一節介紹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編制等等，這都有別於其他同類著作。第四，運用可靠的事實資料，如實地反映歷史。一般不論證、不評議、不總結，讓讀者從歷史本身的發展去辨別人和事的功過是非。

這部書提煉出的新中國經濟史的重大事件和問題主要有：國有經濟的產生與發展；穩定物價與統一財經工作；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第一個五年計劃；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五年調整；“文化大革命”的干擾；歷史的偉大轉折；改革與開放；從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讀者從這些重大事件或問題中，可以清晰地把握新中國經濟的發展脈絡，明白什麼是正確的，應當堅持；什麼是錯誤的，不能重蹈覆轍。

大約在 20 世紀 50 年代，蘇星就立志要寫一部新中國經濟史，到 1999 年寫成並出版，歷經約 40 餘年，如果算到 2007 年修訂再版，則跨越了 50 年。50 載悠悠歲月中，蘇星不間斷地大量收集資料，深入基層調查，開展對實際問題的專題研究，為寫這部書作了充分準備。

他收集的資料，包括文獻資料、會議資料、調查研究資料和當事人口述資料，等等。這些資料，有的他在書中直接引用了，大量的作為背景資料並未直接引用。其中比較重要的，他彙集成一部《新中國經濟史資料選編》，單獨出版了。有的資料，別人手裡的都散失了，惟有蘇星保存下來；還有的，是他直接調查得來的一手資料，或是從文獻中整理的數據，顯得彌足珍貴。

深入基層調查主要有，1957 年調查北京第一機床廠和城市住宅問題；1962 年調查北京順義九王莊大隊；1964 年調查北京通縣宋莊公社翟里大隊二隊和北京第二機床廠；1969 年調查石家莊北宋公社東營大隊；1981 年調查寶鋼二期工程是否上馬問題和調查山東國營企業改革；1984 年調查上海、江蘇、浙江的工業公司；1985 年調查湖南、江西、福建的農產品價格改革；1986 年調查山西、陝西、河南的農村合作經濟；1989 年調查“珠三角”的外向型經濟；1990 年

調查北京市商業；1994年調查安徽農村改革；1996年調查山東濟寧市國有大中型企業，等等。每一次調查，他都親自執筆寫出調查報告，沒有一次是由助手或秘書代筆。通過調查，他對現實經濟生活有了深入瞭解，同時積累了歷史經驗。

專題研究，除了上文介紹的以外，他還研究過我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城市發展與城市化、外向型經濟、國有商業改革等問題。通過研究一個一個的專題，觸及到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以及各個發展階段，為寫作《新中國經濟史》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其中有的專題，如我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國城市住宅問題，社會主義再生產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都直接涉及新中國的經濟史。更有的專題成果，如《社會主義再生產的理論與實踐》和《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著作，已經具有了經濟史的雛形。

蘇星的一生，先後從事大學的教學工作，黨刊的編輯和編輯領導工作，黨校的教學和教學領導工作，事務繁忙。從事研究，主要利用業餘時間。1989年他專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以後，為了集中時間研究新中國經濟史，為自己規定了十條守則，其中包括：不當掛名主編、副主編和編委會主任；不給校外收費班講課；不擔任經濟實體或準經濟實體及民辦高校的董事長、名譽董事和顧問；不擔任與經濟學無關的學會、研究會的會長、顧問或理事；不擔任掛靠在黨校的學會、研究會會長，等等。有了這些守則，確實節省了一些時間，但要完成寫書任務，時間仍然不夠。1995年他已年屆70，兩次給當時的中央黨校校長胡錦濤同志寫信，提出辭去黨校副校長職務，以便集中時間和精力，研究與寫作《新中國經濟史》。1996年下半年，他才有條件集中進行寫作，又緊張勞作了大約三年多時間，終於完成書稿，實現了自己一生的夙願。

二、圍繞基本理論開展學術爭鳴

蘇星一生研究工作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所運用的主要分析工具，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他在學習與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上，十分下功夫。他在經濟學界雖然有較大影響，但從不拉幫結派，也從不捲入與經濟學無關的是是非非。但是，如果經濟學家們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認識發生分歧，蘇星也願意發表自己的見解，與同行們開展學術爭鳴。目的是通過爭鳴，更準確地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論，以便更好地研究現實問題。新中國成立以後，經濟學界發生的理論爭論或討論，蘇星直接參與的有三次。

第一次 —

1953 年在全國掀起學習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熱潮的背景下，蘇星發表題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在我國過渡時期的作用問題〉一文。文章批評了學術界的一些觀點，由此引發了一場持續二、三年的全國範圍的大討論，幾乎當時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參與了討論，蘇星也因此在理論界知名。但那時的他，初入經濟學殿堂，還不熟悉理論聯繫實際的研究方法。他的這篇文章，與其他許多人的文章一樣，存在從概念到概念的毛病。蘇星並沒有因出名而陶醉，他很快意識到自己和許多人的研究方法有問題，按此討論下去很難深入。1957 年他發表文章，對此進行了反思。此後，他轉入研究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問題，沒有再寫過關於基本經濟規律方面的文章。

直到改革開放初期的 1980 年，全國開展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大討論，他應有關刊物的約請，寫了〈怎樣按經濟規律辦事？〉一文。文章結合新中國經濟曲折發展的經驗教訓，探討生產與消費的關係，論證了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惟一目的，而不能把生產需要和其他需要當成目的。此時的蘇星，早已純熟地掌握了

理論聯繫實際的研究方法。晚年，他進一步傾向不再使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概念。理由，一是斯大林提出的這個概念並未經過充分論證，按理經濟規律就是經濟規律，沒有基本和非基本之分；二是這個概念是沿用了布哈林的說法，實際上把利潤與滿足需要對立起來。列寧曾經批評布哈林的說法沒有說到點子上，指出在公有制條件下，剩餘產品不歸私有者階級，而歸勞動者，因此利潤也是滿足社會需要的。蘇星的這一新認識，是從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中得出來的。

第二次 —

1959 年參與關於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問題的爭論。從 1950 年代中後期開始，我國經濟理論界長期持續對社會主義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內部是否存在商品生產問題，開展討論。“文化大革命”中，討論被中斷，改革開放初期恢復討論，不僅規模擴大，人們的認識更有新突破。在五、六十年代的討論中，觀點大體分為“窄派”、“中派”和“寬派”。“窄派”不承認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商品生產；“中派”認為消費資料是商品，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寬派”則認為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都是商品，當時持“寬派”觀點的是少數。

1959 年《紅旗》雜誌發表了人民大學胡均的文章，題為〈關於全民所有制內部商品價值形式問題〉。胡均文章的觀點屬於“窄派”，認為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不存在商品關係，只是利用了商品形式和價值形式，“可以利用它，也可以拋棄它而利用別的形式”。《紅旗》雜誌是黨刊，當時地位特殊、影響大。胡均的文章刊發後，一些不贊成其觀點的老經濟學家，希望《紅旗》就此問題開展討論，發表不同的觀點。編輯部為此向蘇星約稿，於是蘇星寫了〈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發表於當年《紅旗》第 16 期。文章

認為，生產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產品所耗費的勞動，仍然具有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兩重性，因而產品仍然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兩重性即商品屬性。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於全民所有制經濟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社會分工與交換關係發達，同時又實行按勞分配。按勞分配的“勞”，只能是抽象勞動，其具體形態為貨幣工資。勞動者用貨幣換取等量的生活所需，這樣的交換關係就是商品交換關係，而不像胡均同志所說的那樣，僅僅是一種形式。國民經濟是一個整體，消費資料是商品，生產資料不可能不具有商品屬性。文章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生產，價值規律也就客觀存在。認識價值規律，有兩方面意義：對個別企業，是經濟核算的依據；對於整個國民經濟，是計劃管理的重要指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潤是擴大再生產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源泉，也對企業經營有激勵作用。文章發表後，蘇星被列為“寬派”。

從那以後約 20 年，蘇星沒再寫過這方面的文章。1979 年以後，他又重新探討這個問題。在一系列講課和文章中，重點探討生產資料的商品屬性，並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商品生產的觀點的發展變化，作了梳理。他研究發現，列寧沒有受馬克思個別論斷的束縛，從蘇維埃俄國的實際出發，最早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並應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係。他還對長期以來被奉為經典的斯大林關於商品的定義提出質疑，指出斯大林把所有權轉移當作商品的標誌，不符合馬克思和列寧關於商品是兩重物，私人勞動通過價值被當作等同的人類勞動而進入交換的本質規定。蘇星的這些研究表明，他對馬克思主義商品貨幣理論的認識更加深化了。

第三次 —

1992 年，蘇星發表〈勞動價值論一元論〉，對谷書堂 1989 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經濟通論》一書中，否定勞動價值論的觀點進行批評。

1993年，谷書堂和柳欣發表〈新勞動價值一元論〉，答復蘇星。1995年，蘇星發表〈再論勞動價值論一元論——答谷書堂、柳欣同志〉，針鋒相對地爭論。經濟學界稱這場爭論為“谷、蘇之爭”。兩個人是老朋友，爭論的是學術觀點的分歧，並未傷害相互的友誼，也沒給各自帶來什麼政治上的麻煩。

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核心和基礎，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之日起，圍繞著勞動價值論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谷、蘇之爭，是歷史之爭的延續。現在，蘇星已離開人世，但類似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下面，簡要介紹蘇星的觀點。

從英國的威廉·配第，法國的比埃爾·布阿吉爾貝爾和弗朗斯瓦·魁奈，到英國的亞當·斯密，再到大衛·李嘉圖，勞動價值論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才由馬克思批判地繼承，最終建立起科學的理論體系。馬克思的主要貢獻是，第一，創立了勞動二重性理論，這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馬克思語）。第二，以勞動二重性理論為依據，科學闡明了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第三，把價值和交換價值作了科學區分，揭開了貨幣的秘密。第四，闡明了價值規律在簡單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的不同的表現形式，把價值和生產價格區分開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勞動創造價值的一元論。當今世界，還沒有任何一種理論能夠像它那樣反映商品經濟的本質和規律。

歷史上最早否認勞動價值論的，是法國的讓·巴蒂斯特·薩伊。他認為商品價值是由勞動、資本和土地協同創造的，三要素創造價值，也創造收入。薩伊的生產費用決定價值的觀點，幾乎為後來所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接受。他們一般不直接否定勞動創造價值，但認為自從有了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權，就是勞動、資本、土地共同創造價值了。

一個時期以來，這類觀點已在我國經濟學界氾濫，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谷書堂的觀點。例如谷書堂認為：“價值決定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規定，本身就已經確定了非勞動生產要素在價值決定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物質生產領域和非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都創造社會財富，都形成價值”；“社會主義的工資、利息和地租，不過是根據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所作的貢獻而給予這些要素所有者的補償”，等等。谷書堂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不能正確地說明和解釋我們面臨的現實問題”。他否定了馬克思關於勞動生產率與價值成反比的分析，提出“新勞動價值一元論”，主張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加入使用價值的生產以表明各個生產者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別，以此推論出勞動生產率與價值成正比關係。

蘇星在爭論文章中，對谷書堂的上述觀點逐一展開分析批駁，指出“新勞動價值一元論實際是多元論”，指出其要害是“重新混淆了使用價值和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而這是從配第開始，經過斯密和李嘉圖，到馬克思，花了百多年的時間，才弄清了的問題”。他還針對谷書堂認為勞動價值論不能解釋現實問題的觀點，特別對第三產業是否創造價值，科學技術是否創造價值，在理論上如何解釋資產、土地以及商譽等非勞動因素參與分配等問題，運用勞動價值論做出了解釋。限於篇幅，這裡不一一介紹了。

三、治學方法與態度

蘇星一生研究成果豐厚，在治學方法與態度上，也有獨特體會，兩者是有內在聯繫的。1986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小冊子《怎樣學習和研究經濟學》，收錄了他一些關於學習與研究經濟

學的心得體會的文章，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治學方法與態度。1997年，他將幾十年間所寫的與經濟學有關的短文和隨筆，輯錄成冊，以《論外集》為書名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其中也有一些文章是談治學之道的。

1、認真讀原著。

蘇星一生的研究工作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他所運用的理論工具，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時也借鑒參考西方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他認真鑽研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十分認真地學習與瞭解西方經濟學。他對經典著作的熟悉，幾乎到了信手拈來的程度，這背後則是苦讀與鑽研的艱辛。最為可貴的是，不管是對馬克思主義著作，還是對西方經濟學著作，他都抱尊重但不迷信的態度。他的研讀重點，不是經典作家說了什麼，而是經典作家為什麼這麼說，觀點或論斷是在什麼條件和背景得出來的；以及隨著條件和背景的變化，經典作家的觀點發生的變化；還有就是，這些觀點和論斷，哪些在當時就不一定完全正確，哪些當時正確，但今天已不適用了，哪些今天依然有效。正是在這樣的研讀基礎上，蘇星建立起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

學習馬克思主義，他主張讀原著，不贊成依賴解釋性的參考材料。他讀原著，最少讀兩遍，第一遍邊讀邊想，並劃出重點，寫寫眉批；讀第二遍的時候做筆記。他認為，做筆記是讀原著的最重要的方法。筆記的內容，主要是摘記書中能夠反映主要內容和內在聯繫的論點，而不是語錄的堆積，目的是加深記憶和理解，句子長的可以作些刪節。記住書的全部內容，既無必要也不可能，通過記筆記，可以掌握書的中心內容和綱要，用時可以順藤摸瓜，找到需要的觀點。人們常說，要把書讀薄，通過記筆記掌握書的中心內容和綱要，就是把書讀薄了。

2、從專題著手，積之十年。

蘇星認為，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應當從專題著手。專題，有概括性大的，有比較具體的。概括性大的題目，如果沒有對具體題目的研究作基礎，很不容易深入。因此，有必要對概括性大的題目下的一系列具體題目，作認真的研究。最好一個時期抓住一個問題（而不是同時抓幾個），下決心埋頭幾年、十幾年，從收集、整理資料和調查著手，進行研究。魯迅說：“無論什麼事，如果繼續收集材料，積之十年，總可成一學者。”如果大家都能抓住一個問題，從資料工作著手作研究，“積之十年”，那麼經濟學的園圃裡，就會果實纍纍。

蘇星自己就是這樣做的，他一生所研究的專題，幾乎都歷經幾十年。在所研究的專題的基礎上，他寫出了獨具特色的《新中國經濟史》。

3、充分佔有資料。

蘇星說：做研究工作，必須充分地佔有資料。這是許多人都懂得的，但做起來頗難。難就難在“充分”和“佔有”幾個字上。充分，是說研究一個問題，要熟悉前人的研究成果，要遍覽有關的文獻和資料，有些問題，還要深入實際做調查。佔有，是說通過收集、整理、鑒別，把資料變成自己的。這就必須自己動手。研究工作，應當把90%以上的精力放在佔有資料上，資料日積月累，可以使研究者從中引出觀點。

蘇星的《新中國經濟史》一書，在註釋中註明引用文獻和資料的，達872處；《社會主義再生產的理論與實踐》約12萬字165頁，註釋引用的資料，就有226處。至於積累而沒有引用的資料，就更多了。正式動筆寫《新中國經濟史》之前，他把幾十年積累的剪報，分專題放入約兩寸厚的資料盒內備用。共裝了30多個資料盒，摞起來有兩米多高。他對資料工作的重視程度，由此可見。這不僅是個研究方法

問題，還表明他對別人的研究成果的尊重和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

蘇星所處的年代，還沒有個人電腦，他積累資料的方法，圖書主要是做摘錄或提要，報刊則是剪貼或摘錄。他一生作摘錄或提要，積累了九箱卡片，16開200頁的筆記本十幾本。他數十年養成剪報習慣，剪時取材寬一些，每年淘汰一次，去粗取精。多次淘汰以後存下來的，數量少了許多，但都是有價值的。蘇星寫完並出版了《新中國經濟史》以後，把自己一生積累的許多資料都處理掉了，我們現在很難確切統計他所積累的資料數量，只能主要從他的著作中，瞭解他對資料工作所下的功夫。

4、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蘇星認為，作研究工作，大量的資料還是間接得來的。但自己調查是根，經過自己調查，才容易辨別別人調查資料的真偽。他特別推崇毛澤東井岡山時期所作的系列農村調查，也十分欽佩陳雲解決新中國經濟問題採用的調查方法。謹記毛澤東所說，調查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好比一朝分娩；陳雲所說，用90%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用不到10%的時間作決定，並把他們的精神用到研究工作中。他十分反對先有觀點，再去找證據的所謂調查，認為這種調查比不調查後果更壞。他認為，如實地反映客觀實際的調查報告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如實反映客觀實際，就要尊重和虛心聽取基層幹部和群眾的意見。蘇星下去調查，主要是鼓勵大家暢所欲言，他帶著耳朵聽，不明白的就問，從不當場評論。調查之後再梳理大家的意見，做出判斷，親自動手寫調查報告。

5、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蘇星認為，研究工作是探索真理的，發現了真理，還要能堅持才行。這方面，應當向孫冶方學習。一個人不能堅持真理，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自己對真理就不堅定，遇到反對，馬上放棄；二是“私”字

作怪，懾於壓力，不敢堅持。

堅持真理固然不易，修正錯誤也頗難。研究工作難免犯錯誤，一貫正確的人是沒有的。在研究工作中，允許犯錯誤，也允許改正；有了新認識，也允許放棄舊認識。但是，應當交代一下，在哪一點上錯了，哪一個觀點放棄了，不能有意無意地標榜自己一貫正確。

蘇星作研究，不逢迎任何人的意志，也從不跟風，切實做到了陳雲所說的“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對於自己曾經的錯誤觀點和認識的改變，也從不掩飾，而是鄭重地開展自我批評，向讀者做出交代。粗略算一下，他在序言中、文章裡這樣做，不下十幾次。講課，作報告，或與人交談，也常常把這些問題掛在嘴邊。

6、“扶老攜幼”。

蘇星把經濟理論研究工作當成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十分虔誠的態度來對待。他不僅自己兢兢業業作研究，也樂於給別人的研究以幫助。

在他的成長歷程中，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和學者，曾經給予他幫助和指導，如成仿吾、何干之、薛暮橋、孫冶方、王學文、于光遠、許滌新、宋濤，等等。他也盡自己所能，幫助老經濟學家們開展研究工作。20世紀50年代末期，他協助薛暮橋寫作出版《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當時影響比較大的一本書。改革開放初期，他又協助薛老寫作出版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這本書對推動改革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1960年代，他協助于光遠編寫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文化大革命”前和改革開放初期，這部書是我國各大專院校經濟學課程的主要教材。1980年代初期，他協助許滌新編纂了《政治經濟學詞典》（三卷本）和《簡明政治經濟學詞典》，以及《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經濟學卷。這些工作，佔用了他大量時間。他認為，這是自己應盡的義務。

對於同齡人、中年人特別是青年人，不管是經濟學者，也不論是工人、農民、軍人、基層幹部和學生，只要向他請教或與他探討經濟學方面的問題，他都有求必應。例如，現在已是知名經濟學家的鄭新立同志，1970年代末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讀研究生，曾經寫信給並不認識的蘇星求教一個問題，不久就接到了蘇星的回信，使他很高興也有些意外。又如，筆者1980年代在紅旗雜誌社工作，曾幫他管過通信。有一年，他為經濟研究方面的問題寫復信160餘封。在他看來，這也是黨的理論工作者的責任，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必須做的事情。

他1980年代末兼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以後，還為黨校帶博士研究生。到他退下來，共帶出了九位博士。他作博導，不是掛名，而是定期見面（差不多每月一次），推薦閱讀書目，商量研究方向和選題，答疑釋惑，傳授研究方法等。這又要耗費不少時間和精力。

蘇星在生前曾對家人和朋友說過，自己一生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扶老攜幼”。最難能可貴的是，不管是“扶老”還是“攜幼”，他都不摻雜任何個人動機，對無論是誰，都保持正常的學術交往或工作關係。有人評價蘇星是“對上不投靠，對下不利用”，確實反映了他做人的原則。

7、珍惜時間。

蘇星不是專業研究人員，他從事的主要是編輯、教學和行政領導工作，作研究，只能主要利用業餘時間。再加上“扶老攜幼”，時間之緊，可想而知。他解決矛盾的辦法，就是珍惜時間。

他說，“研究，最好有完整的時間。但是不能等著有了完整的時間才開始工作。不能嫌時間零碎，多是由少積成的。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他算過一筆帳，每天擠出兩小時，多數人恐怕都能做到。一天兩小時，一年按三百天算，就是六百小時，大體相當於75個工作日，即兩個半月工作時間。安排

得好，可以做很多事情。蘇星自己把這每天兩小時，安排在清晨4~6點，幾十年“雷打不動”。集腋成裘、積沙成塔，他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這每天清晨的兩小時中進行的。

除了把時間化零為整，還要防止把時間化整為零。意思是充分利用時間，防止浪費。要善於作計劃，安排好時間，包括本職工作、研究工作、娛樂休息等。每天做什麼，清晨就想好，按部就班去做，堅持下去，形成習慣，就能成為時間的主人。

蘇星的時間，就是這樣擠出來的。他認為，“有效地利用時間，不單純是個人的問題，它是一個革命的科學工作者應有的責任感”。他還說，“科學工作者應當樹立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樹立一個把自己的畢生獻給革命科學事業的志向。有了這樣的女思想和志向，你就感到時間有多麼大的價值了”。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莫道浮雲終蔽日，寒冬過盡綻春雷”——這些話，都是蘇星生前十分喜愛、引為座右銘的警句，最終也成為他人生的真實寫照。

斯人已去，風範猶存！